

全球化时代的人民、民族与阶级^{*}

——汤姆·奈恩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研究

刘 烨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国家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工人无祖国”到“祖国之歌是如何唱起”的发展实践过程。奈恩正是这一发展的践行者。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援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探索了人民、民族与阶级三者间的辩证关系。他以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阐释了人民大众与民族主义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对历史的回顾、民族的转向，将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进行了融合和统一，全面解释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体问题，建构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哲学分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人民 民族 阶级 全球化 民族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刘烨，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地址：太原市，邮编 030006。

汤姆·奈恩(Tom Nairn)是当代英国新左派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苏格兰、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民族主义理论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包括在此基础上深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民族观和阶级观分析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不列颠的瓦解》到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再到 21 世纪的《全球矩阵》，过去 50 年间，奈恩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得了突出性的成就，在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家。^①究其根本，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了民族主义的机体当中，并以此构建起系统、客观的理论框架。奈恩在坚持、信奉和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现代世界的真实历史为参照，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基于全球化背景的时代审视和一定程度的新发展、新探索，形成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 本文系 2016 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汤姆·奈恩民族国家的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6BY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3AZX002)和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构主义思维范式下的唯物史观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CZX008)的支持。

① 参见 Paul James, “National 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ultural’: A Critique of Orthodox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9, No. 3, 1989.

一、引言：全球化舞台上的民族主义主体

从20世纪中后叶到21世纪初，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之时，不能不注意到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众所周知，所谓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一体化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民族共同体寻求政治自决和经济自主、强调民族国家政治和区域边界的情感认同、利益诉求、政治效忠、精神意识和实践运动。两者看似是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有意思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并未使民族主义被淡化或抑制，相反，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民族主义也在强化和活跃。可以说，伴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也从不同纵深波及到世界各地，换句话说，正是全球化浪潮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涤荡，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勃兴。作为英国新左派当中最具时代感和敏锐性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奈恩面向社会的新发展和新状况，对全球化舞台上的民族主义进行新的探索，得出了新的分析。

在与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合著的《全球矩阵：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一书中，奈恩指出，“全球化是高度现代性的最后时刻”，^①“全球化像自由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②可见，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激荡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这种社会进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最具主导性的概念之一。中国台湾学者罗志平也指出，“民族主义研究的困难，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时代性’”。^③因而，要研究现代社会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必然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进行基于新的时代特点的分析。

全球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蔓延，与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交织叙事、互促发展的特征。奈恩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两者的复杂关系，指出“历史上，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不同阶段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时刻”。^④对于奈恩来说，所谓全球化，就是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他接着写道，“多样性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姿势、一个可选的展示。全球化可能会给它更多的空间，而不是更少”。^⑤不难看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化，在新的时代，全球化给予了民族主体更多的空间，而非反之。

奈恩进而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民族性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一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他指出，“民族主义开始于现代帝国全球化的起飞阶段，其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期待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和人性化的世界”。^⑥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人们对世界性和人性化的新社会越来越渴望，而民族主义能够为不同地域和共同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供保护和凝聚力，因此，在全球化启动之初民族主义就作为伴生物存在了。二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他指出，“民族国家和传统现代全球化是一起长大的……名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的形

①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London and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5, p. vii.

②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viii.

③ 罗志平：《民族主义：理论、类型与学者》，台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510页。

④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10.

⑤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53.

⑥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4.

成是由全球化工业和商业革命构架的”。^① 换句话说,全球化工业与商业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包围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环境而设定的边界。人类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一个事实愈发清楚明显:在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民族国家对于化解很多后殖民时代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共同体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必须依赖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合法性权威。三是民族性与全球化。他指出,“在全球化舞台上,民族性政治学的复兴变得更容易理解”。^② 在全球化环境中,民族共同体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等级差别愈发凸显,繁荣的发达国家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格局形成,面对这种差距、分化的世界格局,民族性政策必是政治的、经济的选择。奈恩感叹道,“在现代全球化的风暴中——六千种(或八千种)语言、宗教信仰的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种、发散的和不可调和的风俗习惯——才是关键”。^③ 可见,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形势中,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语言、信仰、族裔、习俗的多样性仍主导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毋庸讳言,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要结合新的社会特点,面对现代世界的新发展,与时俱进,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奈恩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丰富,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民族观与阶级观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运用和发展,详尽分析了民族主体的全球化新意。

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与坚持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神圣家族》中这样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进行战斗。”^④ 奈恩继承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并将对人民群众巨大力量的笃信和恪守放在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当中。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不仅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还是其中枢主体和斗争武器。他以对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路径出发,指出,一方面民族主义离不开人民大众这一主体,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承载物。

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让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变得空前紧密,“工业化在遥远偏僻的部落爆发,并传播开来,通过战争和破坏达到最终的伟大的世界统治权。意外事件、不均衡性以及冲突并非‘发展’所固有的,但是他们无疑构建了发展的道路”。^⑤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生产力、科学技术、物质材料、信息观念等在国际市场中流转,区域自给自足的壁垒被打破,而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破坏性的机制却无法打破民族之间的藩篱,并直接导致了民族主义的生发与扩展。对于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人民大众的主导性和本源性是不容置疑的。

人民大众是奈恩民族主义理论构建和解析中重要的主体向度。在他看来,人民大众的集体情感和认同对于民族主义是十分关键的,民族主义的扩散过程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发展,它

^①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5.

^②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London: Verso, 1997, p. 11.

^③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 8.

^④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⑤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 3.

“从西欧的本源出发，在动荡和反应的同心圆中扩散；经过欧洲中部和东部、拉丁美洲，然后穿过其他大洲。1880—1945年多样的统一的帝国主义是这个更大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其派生物是反殖民主义战争和‘去殖民化’。我们都研究了始终伴随它的现象：民族历史的‘重新发现’或发明，城市知识分子唤起了农民的优点……”。^①一百多年来，伴随民族主义的是反殖民主义、民族性因素的复兴和知识分子对下层阶级力量的唤醒。“国家被丢进发展的比赛中，没有时间让必要的机构和干部成熟。因此，他们被迫用其他方式调动起来。掌管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士兵需要一个丰富肾上腺素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在一个速记版本的西方民族精神中发现它。这是基于血液的民族性，人民和国家的一个英雄的和排外的膜拜，建立在习俗、语言、信仰、肤色、烹饪和其他发现可用于包装的东西之上”。^②可见，在全球化的发展竞争中，“群众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好的”，^③精英阶层必须要重新学会从民族性中发现那些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因素，借由这些因素不仅能够实现人民大众的民族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能够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望，可以说“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④在分析如何激发和唤醒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时，奈恩指出，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调动人民的民族性因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诉诸于人民群众或下层阶级能够理解的语言和形式，“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得不邀请群众进入历史，而且请柬必须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书写”。^⑤可见，民族主义离不开人民大众这一主体，如果民族主义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撑，那么必定无法达成其诉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人民大众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主体和载体，还是边缘不发达地区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寻求发展解放的核心力量。奈恩这样写道，“社会结构中包含的能量也远远大于先前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动员的出现把他们从旧的模式中激起并释放了出来”。^⑥足见人民大众的力量之大，及其在民族主义当中的重要作用。奈恩在民族主义的解释范畴中继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大众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烙印着深刻的平民主义维度，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在前景上未必是民主的，但是它总是平民主义的。大众是基础：在真的很贫穷或‘欠发达’地域的典型情况中，民族主义者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寻求人民群众的帮助”。^⑦

在分析了人民大众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奈恩进一步阐述了人民大众在新的时代也必然地需要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和运动。当今社会，“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其民族共同体的情境中，并继续在那个政治框架中看待过去和未来”，^⑧因此“民族主义是与典型的内部运动、人员和人们相联系。这些以相似的方式表现并且怀抱非常相似的感觉。……他们表达了他们人民的本土特性，以一种广泛类似的方式——大概是因为人的灵魂需求”。^⑨可见，民族主义是人民大众的“灵魂需求”，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民族主义将人民大众引入了政治生活之中。民族主义使得“政治也改变了其特

^{① ⑤ ⑦}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p. 340.

^②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1997, p. 59.

^③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51.

^④ 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⑥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49.

^⑧ David Cannadine, “Penguin Island Stor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 4693, 1993.

^⑨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35.

性,它变成一个非精英的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事;‘代表’成为了或者说假装成为了平等主义者,直到现代民主政体得以确立。‘主义’是一种效力,这种效力必定会大规模的实现”。^① 民族主义的平民主义特性改变了社会政治的原本参与者,让政治从“精英”、“代表”关注的事务,扩展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可以说,民族主义扩大了参与政治的主体,让下层阶级民众参与到了政治生活当中,这种赋予人民大众政治权利的行为正是民族主义的伟大作用。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指出,“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② 奈恩指出:“物质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一个均衡的和进步的发展想法……对于那个时间和地点的精英,它自然反映了一个向前的视野。……进步的新信念对野蛮人的前景更有利:给以时间和帮助,他们可能能够迎头赶上。这种救赎被构想为一种既向外又向下的稳定的文化适应的过程。即从中心向外围区域,以及社会阶层的由上向下,从教化的阶级到服务员和劳动人民。”^③ 可见,民族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逐渐地觉醒,相信假以时日能够达成进步与文明;而这种想法从上至下扩展到了人民大众当中,并使他们开始行使“用政治行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权力”。^④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还为文化提供了新的容身之所。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更孕育着国家、族群的危机。因此,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建立和维持民族文化认同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不仅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自由,更加需要归属于某一群体的认同感。正如赫尔德所说“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感”。^⑤ 假如社会主体没有了归属感,没有了特定的文化认同,那么他们就没有了习俗、生活方式和共同的记忆,这是十分可怕的。全球化给原本相互隔绝、独立的民族带来了同化与侵略,摧毁地域上的乡土状况,入侵精神上的自留地,使得民族主体必须要以民族主义来抵抗破坏。奈恩指出:“通过民族主义唤醒逝去的东西,重点是这是其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这些逝去的人和事纠缠着所有的文化并把他们安放到另一个世界。民族主义给文化在这个世界提供了新的容身之所。通过这个机构过去不再是‘远古的’:它主动加入了当下并赢得了一个未来。这是第一次意味深长地规划未来的前景。”^⑥ 依照奈恩的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从来不缺乏经济的急速更新、政治的剧烈变革,如果民族的共同历史经验与主体间的纽带尚不够强大,不足以抵抗外部的侵袭和支撑内部的认同感觉,那么自身传统的生活模式就会遭到冲击,失去文化认同的农民、小业主、知识分子和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必须要重新夺得文化领导权,找到新的容身之所,民族主义在这时恰如其分地出现了,它无论是作为象征还是现实都是最能够重组文化、唤醒认同的手段,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最具效力地把人民大众凝聚成一股力量,为资本主义打击下支离破碎的、奄奄一息的文化认同提供新的家园和住所,可以说,对于保持人民大众文化的同一性、符号性和神圣性,民族主义是无与伦比的力量。

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与人民大众两者是辩证联系、相互需求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

^①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 2.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8页。

^③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36.

^④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 116.

^⑤ 转引自[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011年,导读第14页。

^⑥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 4.

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活动的扩大”。^① 奈恩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科学地解释了人民群众与民族主义的相互依存,通过辩证、客观、理性的分析,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民族主义相融合来解释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主体,为进一步分析奠定了基础。

三、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援用与发展

在奈恩的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具有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目标,因此决不能缺少社会主体力量的革命行为,这个主体力量就是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换言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关于斗争的神圣职责”^②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新时期强大的革命主体。奈恩通过追溯和援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当中关于无产阶级是否要同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争论,讲清了自己的看法。

奈恩指出,1914年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一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争论,这一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民族主义观点。^③ 争论是在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进行的。当时在第二共产国际内部,一种普遍的信念是,全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而且会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进行。当它到来时,它在性质上将迅速成为国际的,虽然它会出生在一个民族中,但在其他地方,革命也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这种扩散中,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将成为久经考验的现实。因此,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在于为这个过程做准备。1914年,情势发展到顶点,它不仅被标记为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增长,同样也是欧洲内外民族斗争的成熟。在欧洲内部,那些成熟的民族国家,如在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都发生着不同民族推翻帝国统治的斗争;而在其他大陆,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矛头直指新近的欧洲帝国主义。如何把这两种反抗或斗争关联在一起,构成了第二国际内部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并形成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民族思想乃至斗争。

一方面,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民族主义斗争明显处在次要的地方。在一些地方,虽然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如简单的反殖民主义战争,但是无论在哪(如在她的家乡波兰)似乎存在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可能需要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做出选择的紧迫问题。前者永远不应该被优先考虑,尤其在革命的中心,例如德国(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视其为未来革命的中心),有义务必须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愿望。对于整个领域来说,民族主义变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列宁则批评和限制了卢森堡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列宁主张,在欧洲,甚至在更接近大都会革命的现场,民族主义有着更积极的意义。民族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激情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真正的“放弃”。而且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都致力于推翻旧的王朝,并因此培养了有利于社会革命的普遍条件。为了瓦解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努力争取这些改变的条件。^④ 列宁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为争取平等的权利”。^⑤ 他有这样的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

^②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26.

^{③ ④} 参见 Tom Nairn,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1/101—102, 1977。

^⑤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

述：“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娴静的‘空想的’（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导火线。”^①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力，“动员剂”，就被压迫民族对抗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而言，“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族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②

对于以上争论，奈恩站在了列宁的一方，他“谴责罗莎·卢森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有着最大数量的错误答案”，^③认为列宁的思想表现出一种务实的精神，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民族主义应该得到鼓励，至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这种鼓励是必要的和正当的。在奈恩看来，“列宁曾经阐述的这些观念，无论对于不列颠群岛或其他地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民族主义问题可以采取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态度。而无论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卢森堡主义，都不能提供这一可能性”。^④列宁谨慎地承认作为具有双面性现象的民族主义应该位于革命战略的核心，他“根据新的历史时代的特点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将无产阶级革命与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探索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在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⑤这种思想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上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发展，也提供了一种实用策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并没有被后来革命的发展所否证，而是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更务实的态度，表明其思想并不是一个直到革命来临时才适用的临时性的或战术性的构想，而是具有永久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上，更体现在对世界的改造上。

然而，列宁的民族观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发展，而且还被错误地修正甚至放弃。首先，自1917年之后，列宁一直致力于应对这个问题。伴随十分苦闷的过程，列宁认识到，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这个问题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甚至使复兴中的俄罗斯成为民族主义的受害者。“锁在一个被单一民族性所左右的欠发达地区，很可能使革命本身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⑥其次，列宁之后的几代实用主义者们僵化地对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完全改变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再次，预期中的欧洲无产阶级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越来越突出。在欧洲，某些民族运动的结果是形成独裁政权，并与保守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连接起来，人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现代资本主义就像一扇门，罗马神贾纳斯（Janus是古罗马的双面神，奈恩以此意象比喻民族主义，——笔者注）站在那扇门上，注视着过去和未来。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现代性的入口，只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黑暗的通道，而且已经占据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⑦

奈恩认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以及民族主义剧变可能导致社会主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②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③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76.

^④ ^⑥ ^⑦ Tom Nairn,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I/101—102, 1977.

^⑤ 詹真荣、熊乐兰：《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

义革命的看法,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但需做两方面的发展:其一是对于多民族国家和社会(包括前苏联)的本质要有新的认识,在这些国家和社会,民族主义的复兴很可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其二是把民族主义放置在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要对其概念进行新的认识,形成新的理论。这两方面的认识,绝不能像过去所做的那样,仅仅对列宁主义做考古学和文本的缄默引用,而是要联系历史和现实加以发展。奈恩深信,通过适当的援用和发展,人们一定能制造出与列宁所讲的大致相同的情况。“事实上,在英国,新民族主义不仅已经成为旧国家的掘墓人,而且像在英格兰以及一些小国,这一主要因素已经促进了某种政治革命……从英国宪政主义的似乎无止尽的迷雾中解脱出来”。^① 奈恩强调,完全不需要为新民族主义做更进一步的辩护,如果一个进步的“二次革命”没有发生,那么保守的反革命就将发生。对于苏格兰、威尔士,甚至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的独立运动来说,新民族主义将使其获得推动进步的动力和光泽,这是一种自我拯救,是凯尔特人政治美德的突显。^②

奈恩以列宁的思想为基础,强调民族主义的革命意义,他把目光转向对民族主体、民族性力量的肯定,重视以民族主体对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动员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整个民族群体的广泛联合,并在无产阶级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力量,推进社会的革命运动,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思想不仅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当中一直以来所争论的问题给出了答案,而且在援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接下来,奈恩就要对民族主义与阶级进行分析了。

四、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探索与创新

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不容忽视的内在推动力,奈恩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点,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传统的阶级观,创造性地对民族和阶级的关系进行了新探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阶级是推动当下历史运动的主体,阶级是作为“无产者”和“资产者”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奈恩在此基础上提升了民族主体与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等首先是“德国人”、“古巴人”、“爱尔兰人”等等,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必定有一种功能,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比阶级意识和这一阶段中单个民族国家的阶级形式更重要的功能。奈恩对世界发展进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现实展望,重点分析了民族与阶级的作用和关系,形成了一种应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一)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与转向民族主体的支配地位

奈恩讨论的主题是民族主义,他从真实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着手分析,不仅回归了历史,还以此方式转向了对民族主体、民族性力量的肯定。他将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工业、技术、生产力的产物,“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长时间的、有趣的不均衡和合并的发展,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政治复杂性,被证明更加富有成果”。^③ 针对这种不均衡发展,奈恩指出:“发展只能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均衡只能产生一个持续的反应,这种政治的推动动员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落后的’、殖民统治的或被判决的(主

^{① ②} Tom Nairn, “The Twilight of the British State,” *New Left Review*, I/101–102, 1977.

^③ Ronaldo Munck,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pital & Class*, Vol. 34, No. 1, 2010.

体)……这样的动员主要是沿着民族的线路而不是阶级的线路。虽然在概念上,声称是普遍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心地带的进步的马达已经假设了有力的民族状况。”^①也就是说,落后的、外围、边缘地区必定会以民族为单位来对抗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压迫。毋庸置疑,动员的对象一定是整个民族群体,而非是其中特定的某一阶级。只有把所有阶层的人民以民族主义的热情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广泛地联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效对抗。正如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所述,“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学家一样,奈恩认为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合并所有的阶级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中来整合社会体系”。^②

由此出发,奈恩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回归到了全球化社会真实的发展领域之中,引出了对民族的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发展统一成一个整体,同时也造成了一个危险的和骤发性的新的社会分裂。“资本主义对世界社会的这种快速植入的社会历史的成本就是‘民族主义’”。^③ 奈恩“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方式将民族主义视为起源于经济因素——但以一种新奇的方式: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就不发达社会的上层阶级意义而言,其来源是跨民族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最直接地打击了他们,并成功地把他们与殖民社会的其他阶级扫到了民族解放运动当中”。^④ 简言之,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造成了民族主义的生发,并使得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到一起进行民族主义运动、寻求民族解放。可以说,“在社会阶层之间,每个地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两个世界性的阶级,可谓,被困在同样的战斗中”。^⑤ 因此,是民族主义促进了阶级之间的联合,使它们以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来进行斗争,由于相同的“不发达”困境,民族成为了现代社会主导性的群体单位。奈恩这样写道,“一个激进的、阶级间的共同体的有意识的形成……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份是与统治的外部力量所相对的”。^⑥ 从一战、二战所激起的两个波次的民族国家的大量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发生,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致的民族运动的复兴,无数现代历史事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共同体能够实现真实而富有成效的抵抗和防御。

除此之外,奈恩还解释了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动力的原因:“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世界历史进入资产阶级新纪元的重要面向。在这个时代,它有两类正当理由作为历史的动力。首先,作为逃离封建的或其他原始体系的一个必要手段,民族主义不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先决条件,而整个资产阶级文明一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的模具中浇铸;并且直到现在才开始打破它。其次——主要在20世纪——民族主义一直作为一个类似的工具,为了让非欧洲社会从另一个体系中逃脱,这对他们构成了一个同样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即西方帝国主义。在这里没必要尝试去讨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有一个双重积极的作用:在外部,作为一种扫除陈旧的或掠夺的社会形态的手段,而在内部,作为一种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员民众的手段。”^⑦也就是说,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社会摆脱贫落走向进步的手段,

^①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pp. 50—51.

^② Bryan S. Turner,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Scottish Problem,”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0, No. 2, 1984.

^③ ^⑤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41.

^④ Shlomo Aviner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3, 1991.

^⑥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40.

^⑦ Tom Nairn, “The Three Dreams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New Left Review*, I/49, 1968.

一方面又是逾越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工具,因此,对于奈恩来说,“民族似乎是历史的超级主体,有着机构和行动的属性:他们‘动员’、‘期望’、‘推动他们自己向前’和‘做出反应’”。^①

显而易见,奈恩认为,民族是现代社会当中占支配地位的主体,“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蔓延,它创造的不是一个均衡的世界秩序,而是一个以不均衡发展、不平等性和压迫为特质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民族主义对于阶级的优势因此内刻在了结构上”。^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Davis)也共享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普遍的民族运动是有助于解放的……在某些情况下,民族的斗争并不具有阶级的成分(如非洲某些无阶级的部落社会),而在其他情况中,民族斗争则是所有阶级的斗争(如在卡斯特罗)”。^③ 可见,当涉及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时,应当强调民族主义与社会发展、人类解放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设法团结所有的内部阶层来争取独立和寻求国家地位。在新的社会状况中,扩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并转向民族主体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旨趣。

(二)拓展阶级意识的范畴、展望民族主义主体的向度以及注重二者的相互融合

《现代贾纳斯》一文是奈恩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此文开启了奈恩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发展。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下,民族主义的解放斗争是更为关键和内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在新的现实状况下,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应只关注阶级矛盾而忽视民族矛盾,不能够只看到阶级的意识形态,更要将其扩展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当中去,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解释现代历史发展并指导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此,我们可以引用政治学家琼·科克斯(Joan Cocks)教授的一段评价来做出一定的说明:“奈恩把民族形成和民族冲突放置在现代历史的中心……从欧洲到世界上所有地方,资本在历史中作为原动力改变了传统世界,奈恩坚持,现代经验的最令人震惊的方面是由这一过程造成的文化政治的瓦解和重新整合。资本主义入侵世界的最重要产品是民族国家:‘相对单一文化的、均质的、单一语言的实体,最终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无限的资本积累的逻辑对其入侵的世界有震动的影响,并产生了一个世界体系,其特点是深刻的分裂和不平等。最引人注目的分裂和不平等存在于区域和次区域,这通常意味着最具戏剧性的对抗在于民族整体之间。民族主义运动是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和对这些对立的表达。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为了统一和煽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半边缘的人民对抗核心地区的人民,从更实质性的强有力的核心国家中刺激民族主义的反应。奈恩从而降低了资本理论中占主要位置的阶级冲突。”^④ 奈恩从三方面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拓展和对民族主义主体向度的展望。

一是,阶级意识的扩展与阶级斗争的突破。在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阐释中,奈恩认为,相对于民族主义,阶级划分已经不是最能够激发人们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入侵的意识形态,为了团结人民,现代精英们必定会以民族主义的热情来团结人民,因为“相对阶级意识的高度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在大众水平上成功了,因为它提供给‘大众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⑤ “在历史中阶级总是更重要……阶级斗争是总是历史变革的发动机,民族性仅仅是它的一个附带现象。因此,后者使得前者黯然失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⑥ 也就是说,传统的

^{① ②} Henry Patterson, “Neo—Nationalism and Class,” *Social History*, Vol. 13, No. 3, 1988.

^③ Shlomo Aviner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3, 1991.

^{④ ⑤}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76.

^⑥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51.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阶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和关键的主题。对此，奈恩指出，随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相继失败，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发、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纷至沓来，事实证明，民族已然成为了与阶级同样重要的核心主体。布莱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和金特·明纳普(Günter Minnerup)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必须承认民族主义的解放力量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附属物，“在政治解放的领域里，民族国家实际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高峰”。^① 在新的社会状况中，单一地探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扩展阶级意识的范畴，适时地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调整和发展。正如政治学家亨利·帕特森(Henry Patterson)所指出的，“(奈恩)显然积极地提出了一种认识民族主义的必要，它打破了一个阶级还原主义”。^②

二是，民族主体的充分性和民族主义向度的有效性。奈恩指出，“‘物质’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斗争，而是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和旧的物质因素来理解民族主义的世界”。^③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国家间的深刻矛盾，现代社会真正的、基本的矛盾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还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充分体现群体意志的民族主体中，在有效动员大众情绪的民族主义向度当中。由此出发，奈恩进一步分析了民族性因素的核心作用。资本主义的蔓延打破了旧的社会形态，而旧社会形态的崩溃总是更加倾向于以民族主体发生，而不以阶级单位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能够起作用，因为它确实为群众提供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东西——那是假定在一个狭隘的唯智论者模式中的阶级意识永远也提供不了的东西……是更大、更易接受、更贴近于大众现实的东西。……它在现代发展中必须有一个功能，或许是比这一时期各个民族国家内的阶级意识和形成更重要的一个功能”。^④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只要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仍占据主导，那么“民族性的地位仍将越来越强大”^⑤。奈恩的这一认识恰恰发展了恩格斯的民族理论，即“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⑥ 随着社会历史和形势的新发展，人们必须认识到真实的发展环境和主要任务，在现代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实现了民族的解放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三是，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融合与统一。奈恩虽然提高了民族在世界历史当中的位置，但并不意味着他要用民族主体完全替代阶级主体，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结合，并探讨了民族主体内部阶级的关系及功能划分。他写道，“阶级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显然是真的”，^⑦ “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困惑，在那里一个民族性的上层阶级统治另一个民族性的农民和工人。但关键是混乱只能根据民族性调节，而不以阶级调节。作为一种动员手段，民族主义更加优于包含在仍然未成熟的阶级意识中的东西”。^⑧ 可见，奈恩十

^① Brian Jenkins and Günter Minnerup, *Citizens and Comrades-Socialism in a World of Nation States*, Pluto Press, 1984, pp. 144—145.

^② Henry Patterson, “Neo-Nationalism and Class,” *Social History*, Vol. 13, No. 3, 1988.

^③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98.

^④ ^⑦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54.

^⑤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 355.

^⑥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⑧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1977, p. 353.

分认同在现代民族主体中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民族国家间的矛盾、问题和混乱首先要以民族共同体为单位进行解决，在还未实现国际主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民族性的调节应该先行于阶级性的调节。奈恩并未把民族与阶级二者放在一个相互矛盾的状况当中，而是进行了融合和统一，他指出，“民族性属性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属性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前者只是在去后者（等等）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多次论述道，“被奴役民族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② 可见，民族主体与阶级主体在被压迫主体中是契合的，他们具有相同的诉求和愿景。

同为英国新左派思想巨擘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虽然不尽赞同奈恩的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超越某些概念的边界，但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视民族主义的政治事实，并确定他们对民族主义具体表现的态度。自马克思以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它不是一个理论原则的问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做出的实际判断”。^③

此外，在理论层面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也试图用一种复杂的历史方法将阶级结构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他们以捷克为例进行分析，指出捷克民族在被哈普斯堡王朝征服后，经由大屠杀和文化同化失去了他们的上层阶级，这些民族精英的消失意味着捷克民族仍然是一个由农民构成的民族，即没有社会和政治领导，没有文化精英，在经济上依赖讲德语的地主。捷克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发现自己受到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剥削，面对这种社会状况，他们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才能挽救捷克下层阶级的贫困文化圈，从而使捷克的工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获得一定权力。^④ 可见，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关怀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方面，将阶级范畴与民族范畴相联系，这样才能符合实际的历史发展走向、适应真实的现代社会状况、有效动员切实的主体力量。奈恩以历史为参照、以现实为依据解释民族主义，在客观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探索了关于民族和阶级的新认识，这是值得肯定的。

五、结束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价值与意义

以色列政治学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里有这样一个评价：“汤姆·奈恩……也许是新左派思想家中关于民族主义最激进的思想家。在许多出版物中，他呈现了一幅复杂的——也许令人困惑的——把民族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图景。”^⑤ 奈恩既继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肯定，又探索性地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整体框架、创新性地提升了民族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主体地位，确立起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理论，给予了人们新的解释范式，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奈恩的思想是英国新左派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解释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民族

①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p. 354—355.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页。

③ Eric Hobsbaw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Vol. 105, No. 5, 1977.

④ ⑤ Shlomo Avineri,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3, 1991.

主义是现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意识形态和运动,然而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水平、历史状况、偶然事件等多方面差异,使得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上与运动上表现出不同的面相。对于民族主义所呈现出的多样性,众多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解读,作为当代最具时代感、创新性的民族主义大师,奈恩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人民论、民族论和阶级论浇筑到民族主义的理论结构中。这一极具创造性、开拓性的理论方法,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解释障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具有时代进步性。

第二,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充分继承和汲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民与民族范畴的思考,是植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我们知道,构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新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实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奈恩不仅以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人民群众与民族主义彼此之间的依赖,而且以列宁的思想为基础洞悉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义及其对抗资本主义压迫的属性,形成了正确的认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奈恩分析民族问题最坚实的思想支撑、最牢固的原则立场和最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从根本上确立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依据和方法论路径,这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智慧,值得我们探研。

第三,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的范畴,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作为在历史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科学、理性、客观的分析,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为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而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已然成为了人类解放的又一超级主体。通过把民族置于社会历史的中心,奈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念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是一种适时的、与时俱进的、非绝对论的理论探索。我们看到,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徐行徐立,寻求传统与现实的平衡联结点,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而从整体观之,奈恩的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确为现代人类社会当中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颖的思路。

第四,当民族国家处于发展水平落后、资本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民族主体诉诸于民族主义就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逐渐认识到应当以民族共同体来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并藉由民族主义来变革社会体制,以发展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指导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反抗。作为苏格兰裔的新左派思想家,奈恩在苏格兰地区具有极高威望,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苏格兰民族运动,推动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进程,体现出苏格兰对不列颠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反抗和不满。虽然 2014 年秋天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最终未能打破不列颠资本主义帝国的统一,但是这一历史性事件无疑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明显,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已逐渐失去其能量,民族主义的社会革命势在必行。可见,奈恩的思想不仅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分析,更是一个指导实践、影响现实的在地策略。

“重新发现马克思一直是新左派的追求”。^① 作为其中最重要政治理论家之一,奈恩完成了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主义的探索,形成了独特

^① 乔瑞金、李文艳:《英国新左派的思想革命与政治诉求——以斯图亚特·霍尔的分析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

的新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理论。政治学家琼·科克斯的一段评论十分中肯，“有充分理由表明，《不列颠的瓦解》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奈恩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不是因为他为了其他一组原则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历史与它不符合。奈恩相信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是正确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世界决定性力量的绝对优势是正确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控制和发展的矛盾体系之特性是正确的，也相信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动态性是正确的。他期待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理论，……建立在整个世界的社会发展之上’。他暗示这种发展将走向社会主义，尽管他所希望的社会主义的沉淀剂和形式是完全不清楚的。在《不列颠的瓦解》中，奈恩把民族主义带到了舞台中心，解释它、维护它，但并不相信它。他把民族主义视为是理性上的错误但是历史上的正确，这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含义；但能够成为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他的愿望之一”。^①

不难看出，奈恩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运用，是以新时代特点为转移的发展和创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关于人民、民族、阶级三者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适应多种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奈恩正是在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碰撞之中，不断发展、不断探索，做出了极具时代感、实践性和创造性的思考，他以自身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证明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Tom Nairn, Paul James,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te-Terrorism*, p. 79.

^②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